

# 学科建制下的规范化：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 70 年（1949 - 2019）

朱鸿军 苗伟山 孙 萍

内容提要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基本要求。与老牌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作为新兴学科，在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进程中，新闻与传播学有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身学科的合法性执着努力。推动研究方法的逐步规范化正是这种努力的一大发力区域。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场域会影响到研究方法的认识判断，但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在 70 年的学科发展中，一直没有忽视研究方法，尤其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传播学“进口”而带来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随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独立而带来的现代学科建制对研究方法的强调，促使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越趋规范化并逐步被制度化重视。过去 70 年，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形成了一些核心议题，达成了方法薄弱、方法制约学科发展等共识，但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从未来的图景看，在显学趋向和“三大体系”建立的背景下，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还将担负助力本学科本土化的新使命。

关键词 新闻与传播学 研究方法 规范化 学科建制

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是指研究的程序和过程是否符合学术共同体所达成的一系列准则与原则<sup>①</sup>。在现代学科建制的学科评价标准中，研究方法是否规范，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底层知识生产机制，牵连整个学科知识创新基础和前提，缺乏方法的规范性会导致很多研究自说自话，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sup>②</sup>。一门学科是否具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已成为判断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sup>③</sup>。与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老牌学科相比，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非常年轻，新闻学自 20 世纪初诞生至今有百余年，传播学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正式引入中国也就 40 余年。过短的历史、老牌学科的俯视以及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竞争压力，驱使

①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128 页。

② 彭玉生 《“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③ 许家林、蔡传里 《论我国会计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学术规范建设》，《珞珈管理评论》2007 年第 1 期。

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本学科的合法性执着努力，而不断推动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规范化，正是其努力的一大重点。

## 一、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与研究方法的认识演变

在谈及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时，有众多研究指出研究的不规范问题：孙旭培和黄旦认为，在新闻传播领域，因为历史、文化和学术训练等多方面原因，存在着很多“随感录”“夹叙夹议的散文”<sup>①</sup>和“记者式研究”<sup>②</sup>；孙旭培针对研究方法的不规范问题谈到，在各种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中，“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sup>③</sup>；李红涛在分析原因时，这个领域因为缺乏学术共同体建立起规范的学术制度，导致各种外部力量不需要“转译过程”，直接长驱直入进入<sup>④</sup>。然而，梳理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70年，却发现，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建制与研究方法可谓共生共长，新闻与传播学学科逐步从无到有，由稚嫩到成熟，由边缘到中心，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同时也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越趋科学化。

### （一）新闻学的诞生及研究方法的提出（1918-1943年）

1918-1943年是我国新闻学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选择这一时间段的原因是，首先，学界历来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我国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而在1943年我党正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之前，中国的新闻学研究受到西学东渐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基本是民主自由、学派多元的格局态势。在19世纪20年代，民国时期的一批新闻人如徐宝璜、任白涛、邵飘萍、戈公振等人有关新闻实践的著作陆续出版。但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新闻学已诞生，但其研究也仍以报刊创立、发文采编为主，加之当时国人办报救亡图存的意义远远大于报刊著述本身，所谓的“新闻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并不是新闻行业关注的重点。新闻学科的合法性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可。1936年在学者刘元钊看来，“新闻学在目前，或者是不能说它是一种科学，但将来是一定可以成为一种科学”<sup>⑤</sup>；1937年学者顾执中认为，“经验就是新闻学……你天天所得到的新经验，便是你的最好的新闻学，无需再进什么学校”<sup>⑥</sup>；1941年《中美日报》读书会编写《新闻学的基础知识》时写道“目下的新闻学……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因此许多学者，包括许多专门研究新闻

① 孙旭培 《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黄旦 《突破“记者式”研究的框式——对新闻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③ 孙旭培 《新闻与传播学术：失范与规范》，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年3月20日。

④ 李红涛 《中国传播期刊知识生产的依附性：意识形态、机构利益与社会关系的制约》，《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总第23期。

⑤ 刘元钊 《新闻学讲话》，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6年，第5-7页。

⑥ 顾执中 《经验便是新闻学》，《新闻记者》1937年第1期。

学的学者，都认为新闻学今日犹未成为科学。”<sup>①</sup>

在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层面，新闻学界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书面关照<sup>②</sup>，但这一时期提到并对新闻学研究方法进行概述和总结的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李公凡，另一个是黄天鹏。李公凡在 1931 年出版的《基础新闻学》中专门开辟了《新闻学研究法》的专节，提出要用正确的方法认识新闻学。“没有方法，或是方法不对，则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或虽有结果而不正确。有正确的研究方法，对学问始有正确的认识，同样要对新闻学有正确的认识，也就必须有正确的新闻学研究法。”<sup>③</sup>李公凡提出了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的、观察的、比较的和实际的。历史的研究法指要在信任 and 了解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认识“新闻学的学科根据”；观察研究法强调的是新闻学者根据特定历史时期进行“精锐地观察”，而观察的准确与否，则取决于个人科学训练的程度；比较法要求学者根据许多不同的理论来加以比较研究；实际的研究法注重让学者“实际地走到报馆或者通讯社里面去”，重视新闻的实践特性<sup>④</sup>。

1933 年 4 月，黄天鹏出版了《新闻学入门》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研究新闻学的方法，中篇为研究新闻纸的方法，下篇为研究新闻事业的方法。在该书中，黄天鹏将新闻看作一种实践活动，除提出了读报看报的方法外，也提出了注重实践、运用比较、唯物史观、从大众出发等研究方法<sup>⑤</sup>。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专门论述新闻学研究方法的著作，成为很长时间内我国新闻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之作。

很显然，此时所提的研究方法更多是广义研究方法，所涉及内容过于宽泛，其所指与我们现今所提具有一整套科学化理念、范式和流程、能具体指引实际研究更为精确、严谨的狭义研究方法相去甚远。

## （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盛行（1944 - 1977 年）

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日渐紧张，国家内外矛盾的日益激化，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救亡图存的宏大历史主题下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李大钊在 1922 年 2 月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大会上就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虽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被引进中国，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众多思想启蒙流派中的一个，并未占据主导地位。

在后续的思想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1937 年，张友渔出版了《新闻之理论与现象》一书，他用阶级斗争的思想来阐释报纸、政治和舆论的关系，受到了当时青年人群的欢迎。1940 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马克

① 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与传播学学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年，第 411 页。

②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

③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1 年，第 23 页。

④ 李公凡《基础新闻学》，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1 年，第 23 - 27 页。

⑤ 黄天鹏《新闻学入门》，上海：上海光华书局，1933 年。

思主义在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领域指导地位的正式确立是在1943年。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受毛泽东指示,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该文一开头便表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新闻学的姿态,并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法西斯新闻学”划清了界限<sup>①</sup>。通过对新闻层面“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剖析,该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领域的指导地位,“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次影响解放区的‘范式革命’”<sup>②</sup>。

自1943年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三反五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三十余年中,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具体思维方法成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主导,甚至唯一的方法论支撑。我国新闻学研究逐步被政治化,以致完全被政治替代<sup>③</sup>,成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工具<sup>④</sup>。“文革”时期,康生、陈伯达等坚持“新闻无学”主张,提出取消高校的新闻系,认为“领导意图就是办报规律……著作者没有东西可写,阅读者没有必要去阅读”……“新闻无学”之风弥漫新闻界,导致我国新闻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sup>⑤</sup>。因此,该时期鲜有关于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论著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即便是有部分关于新闻学的阐释,也主要以口号、语录、工作指示为主。张振亭认为该时期的新闻学研究方法是“异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用马克思基本原理取代新闻规律,以二分的无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分析新闻现象,对新闻的研究是脱离历史和实证的曲解<sup>⑥</sup>。

在后续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批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反思与批判。甘惜分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表示,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新闻学。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用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sup>⑦</sup>。艾丰在阐释新闻的性质时,区分了作为“手段”的新闻和作为“社会现象”的新闻,认为后者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sup>⑧</sup>。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思想和政治上起伏不断的变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新闻学更多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非独立的学科。虽然学者们当时的反思影响有限,但是这些声音为后续新闻学的“拨乱反正”开创了先河。

### (三) 传播学的“进口”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1978-1996年)

尽管本研究将1978-1996年划分为一个阶段,但实际上这阶段因为特殊的历史

① 刘海龙 《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② 刘海龙 《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③ 陈力丹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④ 陈力丹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⑤ 董兵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5页;陈力丹:《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⑥ 张振亭 《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⑦ 甘惜分 《新闻理论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⑧ 艾丰 《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

原因又可以划分为 1978 - 1989 年和 1990 - 1996 年两子阶段。1989 - 1992 年期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处于低谷<sup>①</sup>，传播学被指责为“文化帝国主义工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sup>②</sup>。本研究认为，1978 - 1989 年重点体现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的去政治化转型，受众研究成为这个阶段绝对性的主导范式；1990 - 1996 年学科发展的核心逻辑是为追求学科的正式建制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

1978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整个社会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都处于一种生机勃勃的状态，社会科学（包括新闻与传播学）也是在这种较为开放的社会氛围中开始萌芽。当时的报纸杂志和电视等大众媒体高速发展，“大众传播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根支柱，社会要求推进大众传播研究”<sup>③</sup>。伴随传播学初期“进口”而引入的量化与质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一些科学化概念，包括“受众”“传播效果”“把关人”等，让长久以来受“宣传”“阶级斗争”等观念影响的学者感到了新鲜，“他们还通过突出传播学的科学性，把传播学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来获得研究与思考的自由空间”<sup>④</sup>。

在这样的社会情景和知识场域中，受众研究成为这个时期浓墨重彩的最大亮点。正如王怡红指出的“一些以媒介多功能理论为研究假设的受众调查，直接冲击了新闻媒介的单一喉舌理论，激发了新闻媒体的公众意识，培育了信息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受众观念，将受众的重要性与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一起推向了传播研究的前台。”<sup>⑤</sup>在学术实践领域，1979 年复旦大学学生做的受众研究，198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合作做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以及卜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妇女儿童做的一系列受众研究等等，都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从事的第一次调研，是“中国研究人员第一次尝试用量化的思维来解决新闻传播中的问题”<sup>⑥</sup>，被安岗誉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为”<sup>⑦</sup>。从 1980 年至 1988 年，在各类新闻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受众研究的论文共计有 226 篇<sup>⑧</sup>，受众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当时传播学研究中“有所突破，取得成绩最大的”<sup>⑨</sup>。

在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中，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祝建华。1985 年他在《新

① 黄旦、韩国颀《1981 - 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 年第 1 期。

②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黄旦、韩国颀《1981 - 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 年第 1 期。

③ 廖圣清《我国 20 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 年第 4 期。

④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⑤ 王怡红《传播学发展 30 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 年第 5 期。

⑥ 朱卉、聂慧敏《我国新闻与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历史概述》，《新闻世界》2015 年第 3 期。

⑦ 崔清活《中英传播学教育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7 年，第 56 页。

⑧ 陈崇山《中国大陆传媒受众调研的发展历程》，《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年第 4 期。

⑨ 徐耀魁《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 年第 4 期。

闻大学》发表了《传播研究的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实验控制》三篇介绍性论文。1987年他发表的论文《传播学量化研究的科学起源》被认为是最早以科学方法文章<sup>①</sup>。这篇文章提出了当时看来超前的观点，例如学术的过程比结果更加重要，结论要通过证据或逻辑支撑。

1992年之后，伴随中国进入市场经济<sup>②</sup>，传播学研究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原来寻求促进新闻领域变革不再是新闻与传播学术思想领域的中心问题，研究者开始把学术立场和研究兴趣转向了传播学与经济变革和文化建设相互联系等方面<sup>③</sup>。与此同时，整个新闻与传播学术界也在蓬勃发展，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传播学走出低谷。然而，与文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老牌学科相比，新闻与传播学的学科地位还很弱，1987年“新闻与传播学”才被承认是一个学科<sup>④</sup>，并且还是属于文学学科下的三级学科，1990年，新闻学才被提升为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如何摘掉“新闻无学”的帽子，如何赢得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如何成为现代学科建制所认可的成熟独立学科，依然是这段时期整个新闻与传播学界急切追求的历史使命。在剖诊和反思本学科发展时，研究方法薄弱而带来的知识生产门槛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不够，被视为影响学科地位的重要因素，1997年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关于传播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sup>⑤</sup>。当然，此时新闻与传播学界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整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密切相关。这个时期，学术领域关于方法规范的探索成为“学术界的一大学案”<sup>⑥</sup>。

上世纪90年代，在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卜卫和刘晓红成为这个领域当仁不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刘晓红发表了多篇文章将心理学方法介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sup>⑦</sup>，卜卫1996年开始在《国际新闻界》连续发表7篇研究方法的介绍文章。最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在1994年到1996年的三年时间里，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与设计”，其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更是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承认的是，尽管进步巨大，但是这个时期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相关研究基于对这个时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分析统计

① 陈力丹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②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③ 王怡红 《传播学发展30年历史阶段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5期。

④ 陈力丹 《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⑤ 廖圣清 《我国20年来传播学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⑥ 杨玉圣 《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振亭 《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⑦ 刘晓红 《试论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刘晓红 《试论心理学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作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3期。

发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大量的文章还是介绍和学术探讨的，以定量作为研究方法的经验研究非常少。<sup>①</sup>

#### （四）新闻与传播学的大繁荣和研究方法的渐趋规范（1997 年 - 至今）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后，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媒体和社会变迁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新闻与传播学进入了大繁荣的新阶段。在这其中，我们将研究方法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97 - 2010 年，学科的快速发展与研究方法的进步甚微；2011 年 - 至今，学科显学地位的初显与研究方法的渐趋规范化、多元化及对研究方法的反思。

1997 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这标志着新闻与传播学学科地位的官方合法性已经得到认可，由此将学科发展拉入快车道。然而，与学科地位提升相映衬的是，研究方法薄弱的尴尬。“没有方法”或“学术不规范”成为其他老牌学科尤其是新闻与传播学越趋归属的学科——社会科学所诟病最多之处。在此背景下，研究方法的重视被寄予厚望，成为寻找突破的点<sup>②</sup>，并且这种重视被逐步制度化。方法类专著和译注大量涌现，研究方法逐渐被纳入日常教学科研中。在研究方法的各种教材和书籍的翻译、引入和撰写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 2000 年戴元光和苗正民编著的《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2002 年王锡玲的《传播学研究方法》，2003 年柯惠新、祝建华等人编著的《传播统计学》。在其基础上，不少的高校将研究方法纳入传播学的教学体系，但有研究者指出，目前的实证方法课程不仅在课程质量上不够规范、在设计上缺乏连贯性、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着方法和概念之间的不衔接<sup>③</sup>。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研究方法领域优质师源的缺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学科内能够真正掌握研究方法的学者数量较少，这就导致了一些高校教师在自身尚不熟悉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就冒然开始进行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工作。”<sup>④</sup> 研究方法的训练直接影响了本领域的知识生产，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博士生的论文写作。有研究通过对 1988 - 2011 年间中国新闻与传播学 536 篇博士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在 2003 年以前，量化研究的使用基本为零”，总体上，51.55% 使用了质化方法，30.62% 属于思辨研究，11.05% 采取了质化量化混合方法，6.78% 属于量化研究<sup>⑤</sup>。

① 黄旦、韩国颀《1981 - 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 年第 1 期；陈昆玉、江宇《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进步与不足：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播学实证性研究报告的统计分析》，《当代传播》2002 年第 4 期；李彪《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对 1995 - 2007 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08 年第 1 期。

②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

③ 王锡苓、姚慧、段京肃《对实证研究方法课程在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现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007 年第 7 期。

④ 周翔、韩为政《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教育中的现存问题与提升路径探析——以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新闻传播研究方法〉为例》，《河南教育（高教版）》2016 年第 10 期。

⑤ 吴锋《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反思：基于 536 篇新闻学博士论文统计研究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 年第 12 期。

因此,1997至2010年这14年的时间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种状态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验证。有研究对1995-2007年来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学新闻界》《现代传播》和《新闻大学》)刊载文章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考察,发现主流研究方法是思辨辩证法<sup>①</sup>。还有研究以1998-2012年15年间这4本代表性学术期刊为案例,发现实证研究里以定性研究为主,具体研究方法则集中在个案研究、历史文献等<sup>②</sup>。如果说这4本期刊之间或者在不同时间段存在着差异,还有研究对特定期刊进行分析,例如对1994-2003年《现代传播》的研究发现,定性占比多,定量研究很少<sup>③</sup>。有研究对2008-2010年《国际新闻界》的发文统计发现,批判或诠释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sup>④</sup>。还有研究对2009年我国3本主要学术期刊《国学新闻界》《现代传播》和《当代传播》进行分析,发现295个样本中,定性占85.2%,而且大部分定性采用的是观察研究(69.3%),“倾向于描述和解释传播交流,依靠现存理论的标准来批判传播”<sup>⑤</sup>。

当然,如果以中国新闻与传播学自身历史作为参考比较,比较上世纪80、90年代的状态,从某些维度上很容易得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方法在不断地规范和发展。但是,在中国早已是全球知识共同体有机组成部分的当时,非常有必要比较这个时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新闻传播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状态。有研究以1996-2005年中美两国新闻传播两本顶级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美国的《大众传播季刊》(JMQC)为案例,发现鲜明的对比是,《新闻与传播研究》是人文主导,《大众传播季刊》是实证主导<sup>⑥</sup>。将《新闻与传播研究》与美国新闻传播另一本顶级期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简称《传播学刊》)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在定量研究中《新闻与传播研究》集中在内容分析,《传播学刊》则在问卷、实验和内容分析上比较均衡;在定性上,《新闻与传播研究》使用最多的是文献分析法和档案分析法<sup>⑦</sup>。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数据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被推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地段<sup>⑧</sup>,在我国,互联网以加速度方式渗透进社会各个领域并由此推动新

① 李彪 《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期。

② 刘尚正 《15年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透视》,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4年,第36页。

③ 张莹、申凡 《从〈现代传播〉(1994-2003年)管窥我国十年来的传播学研究》,《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④ 刘方 《传播学研究方法使用概况——基于对〈国际新闻界〉2008-2010年期刊的分析》,《东南传播》2011年第7期。

⑤ 沈翠婷、王海龙 《中国大陆地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应用现状分析——对我国三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东南传播》2011年第4期。

⑥ 江宇、朱莹 《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⑦ 董天策、昌道励 《中美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以2000-2009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7期。

⑧ 吴小坤 《大数据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闻与传播学研究迅猛前进，以及经过自 1997 年以来学科地位被正式认可后十多年的快速累积发展，新闻与传播学不仅完成了学科合法性争取的努力，扔掉了“无学”的帽子，而且渐趋成为一门显学<sup>①</sup>。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领域，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运用越趋规范化，并越趋多元化，既有诠释、批判等传统人文研究方法，同时社科研究方法也从质化与量化的二元方法路径朝向质化研究、量化研究和计量研究三条路径发展<sup>②</sup>。

然而，在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渐趋规范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另一种对方法进行反思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其中尤以对各种新方法质疑为甚。近些年，大数据、机器学习等热潮席卷整个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学也不例外，各种新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引入，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2005 年，黄旦和丁未曾基于对大陆传播学译著的研究提出“我们总是有一种学科意识或者情结，忙于填补各种空白。目前大陆传播领域教材兴盛，深入研究过于凋零；只见忙于填补所谓的各种‘空白’，不知或不屑做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许多学术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些狂热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下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sup>③</sup>

这种反思在方法大繁荣的今天同样给我们警惕。在中国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大数据等方法的引入导致了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认知，这也造成了对此的巨大争议：狂热和排斥。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在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最基本的方法根基尚未稳健，大量新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介绍，让不具备研究基础且喜欢追逐新鲜的浮躁学界更加躁动。正如一位受访者指出的，“今天你要是不说大数据、机器学习或者高级方法，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你的研究，但实际上我们很多同行连最基础的回归分析都没搞清楚”，“目前就是不会走，先要飞”<sup>④</sup>。另一方面，尽管很多研究在呼吁以研究问题和理论为导向，方法是为理论服务，是通过严密的程序方法进行科学的推断和论证。但是，目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同仁并没有达成以理论贡献作为研究价值判断的共识<sup>⑤</sup>。这也成为大数据等研究方法被攻击的主要依据：缺乏问题意识。这种狂热和排斥之间的争议，集中体现了目前学术界共识的缺乏。实际上，问题、理论和方法是相互佐证支撑的。研究问题和理论是论文的核心，方法为理论

① 喻国明撰写的《传播学何以成为热门学科？——兼谈当前社会观察与治理逻辑的创新视角》（《解放日报》2014 年 2 月 13 日）一文对显学的定义“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

② 吴小坤《大数据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

③ 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 年第 2 期。

④ 2018 年 6 月 2 日，作者对北京某 985 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某海归学者的访谈。

⑤ 苗伟山《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海归学者的学术实践与身份认同》，《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 年第 12 期；苗伟山、贾鹤鹏、张志安《为何缺乏本土化关照：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发展中的问题反思》，《新闻大学》2018 年第 4 期。

服务，但任何问题假设需要方法的检验和证明，否则都是一种假说<sup>①</sup>。

与之同时，学界依然认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较为薄弱。如果我们仍然从期刊论文方法的使用来看，目前新闻与传播学的主要方法仍然是以思辨为主。正如张国良对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的两次研究回顾，在前三十年（1978 - 1998年）“思辨（其中多有主观臆断、片面武断以及老生常谈的情况）仍然为主流，占65%”，实证方法从无到有，但是尚未成为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创新乏力、质量偏低”<sup>②</sup>。2008 - 2013年张国良再次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发现思辨仍然是最大比例的研究方法（56%），而在这其中“概念推理”（75%）是最主要的思辨类型<sup>③</sup>。同样，我们以中国最火热研究议题新媒体研究为例，相关研究通过对2010 - 2012年6本CSSCI新闻传播期刊关于微博的研究发现，在研究方法层面，思辨性论文近7成，大部分研究停留在诸如意见领袖、社会网络、媒介环境学等单个理论的解释层面，且“85%的研究论文没有进行文献回顾，每篇论文平均引用5.21篇理论文献”<sup>④</sup>。与此对应，有研究通过对海外54篇关于微信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研究已经不局限于单一理论的检验和拓展，而是进入到多个理论整合建构模型的阶段<sup>⑤</sup>。与此同时，相关研究也发现这个阶段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仍然维持在以量化为主导（50.78%），兼具质化（32.43%），同时混合研究方法并存的局面（16.58%）<sup>⑥</sup>。此外，有研究通过对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期刊编辑的深度访谈发现，研究方法的不过关是稿件被拒的主要原因之一<sup>⑦</sup>。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的核心议题

### （一）方法薄弱、学科影响与归因探讨

正如上文历史梳理所展示的，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方法的薄弱，尤其是规范性不足，已经成为阻碍学科发展的制约因素。这种制约体现在多个方面，不仅导致了学科内部难以进行深入持久的对话和知识积累，也造成了新闻与传播学和其他

① 丰帆、周萃 《传播学研究的动力：多层面、多角度、多方法——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访谈录》，《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② 张国良、胡薇 《传播学在中国30年：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载冯应谦、黄懿慧编著《华人传播想象》，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12年。

③ 张国良、张巧雨 《中国传播学研究近况实证分析——以专业期刊论文为研究视角（2008 - 2013）》，《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④ 杨喆、冯强 《微博研究回顾：主题、理论与方法——对6份CSSCI新闻传播类期刊相关文献的定量分析（2010 - 2012）》，《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⑤ 甘春梅、梁栩彬、李婷婷 《使用与满足视角下社交网络用户行为研究综述：基于国外54篇实证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图书情报工作》2018年第4期。

⑥ 李小华 《多维视角与深度探析：美国传播学旗舰学刊论文分析》，《中国出版》2013年第8期。

⑦ 朱鸿军、苗伟山 《作为知识把关人的学术期刊——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学6本CSSCI期刊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17年第6期。

社会科学对话的障碍，以及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困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大陆新闻传播研究属封闭型，写作的格式和内容均与西方学术传统要求相去甚远。”<sup>①</sup> 不仅如此，当规范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基础保障，方法就与学术训练、专业性甚至是学科合法性密切相关，成为学术研究区别于新闻报道和行业研究等非学术知识的重要区别之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中方法的规范性问题？我们认为，这其中存在两个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一是知识价值取向和知识生产传统，另一个则是学科发展和制度安排。对于方法和方法论的关注与讨论，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论之争，即对于什么是知识，应该如何去理解并应用知识存着不同的阐释。正如澳大利亚学者卡特（Carter）和里图（Little）所言，认识论决定方法论的选择，同时认识论又通过具体研究方法得以展现。换句话说，对“知识是什么”的理解将会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展开研究<sup>②</sup>。这种认识论，体现了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所发展出的学者对于学术知识生产以及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国学术研究和传播总是以道和德为出发点和归宿”<sup>③</sup>，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研究“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sup>④</sup> 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研究取向理解为“应然”和“实然”的区别<sup>⑤</sup>，前者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规范和治理意识，后者则反映了基于证据的实证主义精神。

在以上对于知识不同认知的学术传统下，中西方因此发展出了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关注总体趋势和宏观把控；现代西方的科学体系讲求逻辑、细节和严密的推理。以思辨、整体性和感悟为主的中国学术知识脉络，“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sup>⑥</sup>。孙旭培在概括中国新闻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式时说“中国学术研究和传播总是以道和德为出发点和归宿，即‘文以载道’，侧重整体把握和宏观着眼，‘坐而论道’，很少做微观细致的分析研究。”<sup>⑦</sup> 郭可等学者在比较中美新闻与传播学术传统时表示，宏观思辨的学术

① 苏钥机《学术边缘地区的传播研究发展——三个中国社会的启发》，臧国仁主编《中文传播研究论述：1993年中文传播研究暨孝文学研讨会论文集汇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院研究中心，1995年，第39-55页。

② Carter, S. M., & Little, M., "Justifying knowledge, justifying method, taking action: Epistemologies, methodologies, and method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vol. 17, no. 10, 2007, pp. 1316-1328.

③ 《北大新闻学茶座——孙旭培教授谈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失范与规范》，《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

④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⑤ 孙旭培《试析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问题》，《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4期。

⑥ 孙旭培《试析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失范问题》，《中国传媒报告》2008年第4期。

⑦ 《北大新闻学茶座——孙旭培教授谈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失范与规范》，《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12期。

思维方式使得研究方法的规范性难以确立，以致我们的学术研究质量无法得到提升<sup>①</sup>。

也许有人会问，同在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浸染下，为什么我国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规范性要强于新闻与传播学？我们需要承认的是，这其中涉及到学科发展和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的问题。当传播学被当做科学化的象征引入中国后，最早是栖身于新闻学的学科体系下，而后者在较长的时间内，被归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科中的“文学”之下，1981年，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第一批新闻学研究生，被授予的便是“文学硕士”学位<sup>②</sup>。这种不同于西方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路径，导致了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文学学科的知识范式所主导，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论是从教学安排，还是学术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sup>③</sup>。

## （二）方法的选择：质化和量化的争议

方法意味着特定的规则和惯例，是学术共同体默认的一套标准。尽管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质化和量化的讨论不断，但是新闻与传播学领域还未对此有较为规模化的关注。也许正如某研究认为的，一方面对方法的评述需要建立在对其充分理解并有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这样我们才具备了评述它的资格”；另一方面，国内的学术研究仍然以思辨为主，质化和量化的“差异还没有给国内学者造成足够的困惑”<sup>④</sup>。换言之，关于质化和量化的讨论是在研究方法普及之后更加深入细致的探索。

需要承认的是，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方法的规范性问题尚未解决，即使是这个领域近些年来数量比较多的质化研究，大部分“没有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与随感而发有几分类似”<sup>⑤</sup>。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认识世界大致可以包含四个角度：实证的（positivist）、诠释的（interpretative）、建构的（constructionist）以及批判的（critical）<sup>⑥</sup>。尽管有研究试图将中国传统的思辨研究纳入到西方的批判范式中，但是早有学者指出，“与批判学派相似的是我们关于切入的某些视角”，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没有批判学派的思辨能力和理论色彩（因不具备这样的理论功底），又不谙美国学派的实用调查技能和

① 郭可、张军芳、潘霏《中美新闻与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② 陈力丹《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③ 李彪《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期。

④ 张敏、任中峰《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当代传播》2011年第5期。

⑤ 张振亭《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⑥ Neuman, L. W.,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6th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2007, pp. 32-46.

方法，实际上是用美国的理论做定性研究”<sup>①</sup>。这种批判之后的十多年，类似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2007 年基于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论文的文本统计发现，很多论文“既不是纯粹的实证研究，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批判研究，更多是个人体会和感想之类的论文”<sup>②</sup>。

尽管如此，新闻与传播学领域也同样面临对质化和量化的理解与选择。在我国社会科学既有的研究中，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将质化量化的方法进行区别比较，凸显两者的差异性<sup>③</sup>，例如有研究从研究问题、程序、策略、工具等方面区分两者的不同<sup>④</sup>，有的从认识论、本体论、具体方法、特征、研究过程以及对彼此的批判来阐述量化和质化方法的区别<sup>⑤</sup>。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质疑这种将质化量化截然对立的思路<sup>⑥</sup>，强调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呼吁在研究中将质化和量化进行整合<sup>⑦</sup>。

在新闻与传播学有限的讨论中，有研究从认识论的层面，认为定量和定性都是源于经验主义，认为知识只能来自人的感官经验，故而特别强调经验证据，两者的分歧则在于客观经验主义和主观经验主义，但是建立在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共性让他们都遵循观察、归纳、演绎、测试和评估<sup>⑧</sup>。另一篇值得关注的研究则来自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孙五三和刘晓红，她们对七个常见的关于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认知误区进行了系统性地深入辨析，认为两者并非与某种特定的“科学哲学、推理逻辑、抽样及测量技术，以及某种价值观有固定的联系”。对此，她们提出具体方法的选择应该以研究问题为导向，选择最适合的与之匹配的方法<sup>⑨</sup>。

### （三）方法之后是什么？围绕研究方法的话语讨论

有关研究方法的争议问题随着新闻与传播学不同的历史阶段而不同。20 世纪 50 - 80 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基本处于“有无方法”的论争中。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范围传入中国，围绕这一变动的探析主要是方法层面的规范性评价标准问题，如数据收集、分析、操作规范等。进入 21 世纪后，学者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引入之后怎么办”，这时的争议并非是完全

① 黄旦、韩国颀《1981 - 1996：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几种新闻学术刊物的简略考察》，《新闻大学》1997 年第 1 期。

② 江宇、朱莹《比较视野中我国内地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西南石油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③ 梁丽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歧异与整合》，《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④ 风笑天《定性研究概念与类型的探讨》，《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3 期。

⑤ 鲜兰《论教育研究中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结合》，《教学研究》2008 年第 2 期。

⑥ 张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国外理论动态》2016 年第 5 期。

⑦ 谢立中《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联结：来自韦伯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⑧ 徐天博《超越质化量化二元观——传播学研究方法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5 月 24 日。

⑨ 孙五三、刘晓红《量化 vs. 质化是非七辨》，《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年第 4 期。

关于方法本身技术层面的讨论，更多则是关于方法与研究、方法与学术、方法与知识以及更宽泛层面上价值的讨论。本文梳理了学术领域围绕方法的三种常见的话语表述。

第一种质疑方法对于知识贡献的价值。一类常见表述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量化研究’实际上仅仅是使用小规模样本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经过简单的比例运算，在资料呈现上采用了图表的形式，基本上没有对变量关系进行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是差不多不需要借助调查即可以知道的‘常识’。”<sup>①</sup>这类话语认为，单纯引入一些简单的统计或者分析，只是构成了一些形式上的方法规范，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知识增量。与此呼应的另一种常见表达则是对各种高级、前沿甚至复杂研究方法的批判，认为目前的研究存在着为方法而方法的倾向，忽略了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第二种认为方法束缚了研究者的思路和想象力，过度强调方法导致研究缺乏洞见与趣味。作为学术共同体，每个学科和领域都对学术知识的价值有着特定的评判标准。实证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往往被认为过于琐碎或者缺乏洞见，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学术传统、取向和偏好相关，我们应该以本领域的标准对其进行评判，而非以新闻报道或者文学作品的洞见或者趣味性来衡量。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适用的范围、假设和前提条件，方法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之中。正如彭玉生提到的，对西方学术规范化的学习和应用，将避免我们的研究仅仅是一些观点、观察或者经验，而没有理论依据或者经验支持<sup>②</sup>。

第三，还有一种流行话语认为中国的问题过于复杂，量化研究过于简化脱离现实。这类看法对量化研究的思路不甚了解。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研究者无法面面俱到，涵盖所有影响因素。各个学科都是从各自的路径和视角切入，贡献多元化的理解，试图在多元对话中丰富对社会复杂性的理解。理论也是在这种思路下对于现实的简约化思考，这种简约化目的在于甄别核心变量，“让研究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把握并提取感兴趣的关系”<sup>③</sup>。这类话语也体现了在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方法往往和本土性的讨论混杂在一起，例如认为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分析工具。这已经超越对于方法和知识本身的探讨，往往涉及到价值立场、身份、历史等一系列议题。正如刘海龙所言“本土化问题之所以难解，在于它将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普世主义与西方霸权等多组复杂的问题都搅拌在了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sup>④</sup>

① 张敏、任中峰 《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当代传播》2011年第5期。

② 彭玉生 《“洋八股”和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庞珣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定义、规则与操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

④ 刘海龙 《传播研究本土化的两个维度》，《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

### 三、总结、讨论与未来图景

具有一套规范化、科学化研究方法是一门学科独立、成熟的标识性符号，这是现代学科建制的共识，同时也逐渐为新闻与传播学界所普遍认可。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不同时期对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认识，但都并未对其忽视。1978 年以来，传播学引进而带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伴随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独立而带来的现代学科建制对研究方法的强调，使得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越趋规范化并被制度化重视。从过去 70 年关于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的核心议题来看，虽然对研究方法的质疑不断，提出了“反对唯方法论”和“方法祛魅”的声音<sup>①</sup>，但“方法对学科发展非常重要”和“新闻传播研究方法薄弱亟需加强”成为主导声音<sup>②</sup>，有更多学者已不纠缠于“方法是否重要”等命题的论证而开始聚焦于方法的具体技术操作层面的研究。此外，从现代学科建制的要求来看，重视研究方法规范化，并非暗含着“方法至上”的提倡。方法是手段，是工具，是服务于有现实价值和理论贡献问题的研究<sup>③</sup>，方法的规范化是为了让研究的问题更具科学性，这才是现代学科建制所倡导的主导价值。当下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不仅已初步完成了其学科合法性、独立性的征程，而且已露出显学的趋向，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的讲话中将新闻学列为十一大支撑学科之一。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将面临着如何满足学科迈入高阶地位的新要求，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与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助力本学科本土化的新使命。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新中国 70 年新闻与传播学科发展及其学术规范化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通讯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① 张涛甫 《方法“祛魅”》，《新闻大学》2019 年第 9 期。

② 吴小坤 《大数据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重构与进路》，《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

③ 卜卫 《论社会调查方法的逻辑及价值》，《国际新闻界》1997 年第 1 期。

## 5 Theoretical Genealogy and Local Exploration: A 70-year Study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China (1949 – 2019)

---

•*Liu Tao*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ies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aking the theoretical formation as "longitude" and the timeline as "latitude". Specifically, we have four dimensions: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irstly, theoretical transl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s brought about by them to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secondly,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pays attention to the seven academic tradition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discusses separately the evol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the seven traditions; thirdly, theoretical criticism probes into Chinese local studies' criticism of and reflection on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cluding theoretical discourse criticism and research paradigm criticism; fourthly, theoretical innovation bases on the communication thoughts, issues or practices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ies in views of development and criticism. It has to be admitted that there is a long way to go for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ies, especially for them breaking through the issue context and interpretative frame of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 21 Normalization under Discipline System: A 70-year Study on the Methodolog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1949 – 2019)

---

•*Zhu Hongjun, Miao Weishan, Sun Ping*

The standardiz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moder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ol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a new disciplin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legitimacy of its own discipline for most of the 70 year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ew China. Promoting the gradual standardiz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s a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such efforts. Although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field of specific times will affect the understanding and judgment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New China in 1970's, research methods have not been neglected, especially since the late 1970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s brought about by the "import"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the mid-1990s. The emphasis on research methods by the modern discipline system has promot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to become more standard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ology has formed some core issues, and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methods are weak and methods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disputes betwee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 value of methods to knowledge contribution is small, methods will restrict researchers,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too simpl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end of prominenc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ree system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will also take on the new mission of suppor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mechanics.

### 36 Journalism Accelerated: The Changing Temporality of News Work in the Digital Era and the Consequences

---

•Wang Haiyan

The shifting temporal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nges in journalism in the digital era.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in the convergent newsrooms in the newspaper groups in five Chinese cities and 92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ir journalists , this study explored how new kinds of temporality are practiced in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Four types of temporality are analyzed , i. e. accelerated time , advanced time , stretched time , and conflicted time , which reflect changes in five temporal dimensions , i. e. duration , sequence , frequency , rhythm , and timing. As a result , new routines which encourage 24 – hours non-stop news operation have emerged , imposing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anxiety and widespread burnouts among the journalist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necessarily led to changes in temporality of journalism , yet journalism itself is slow to realize and respond to the changes , and this may threaten the professional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of journalism in the long run.

### 55 Correction of the Defects of Privacy Subject Grading Theory—Comment with Wang Min

---

•Yao Yao ,Gu Lip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discussion on the privacy classification theory of Wang Min’s article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personal privacy in the era of big data—a hierarchical path based on communication eth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heory of privacy grading is based on the fallacy of “personal rights can be treated differently”. Secondly , the division of old , women , children and public figure is not fit on the reality , which is need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Finally , privacy grading theory does not consider the reality of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privacy protection system. Based on those problem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thre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future legislative practice: Distinguish information and data; Integrate information and data into market mechanism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propertyization; Extend the concept of “protecting the weak” in grading theory , compensation for the digital vulnerable groups through afterwards relief measures. Last one , the original pyramid-type privacy research framework was revised to adjust the order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become an olive-shaped research framework.

### 67 “Ethnic Conflicts” and “Terrorist Attack”: Digital Discourse Frameworks in Wikipedia: Taking Kunming “3. 1” Event and London “6. 3” Event as Examples

---

•Gan Lihao ,Guan Yonglu ,Fei Jin

Wikipedia is not only a knowledge storage platform ,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platform , but also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Compared with the paper encyclopedia that represents the elite ideology ,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Wikipedia universal collaborative editing model is neutral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sist the control of power and capital. However , choosing the English Wikipedia entries of “6. 3”